

思想周刊

理论

第 113 期

发展人工智能 优化就业结构

吴飞飞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冲击,我国正加快推进以人工智能、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助力复工复产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从业者的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同时,人工智能也会对程序化、重复性、低技能的劳动力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为此,我们应在充分考量省情的基础上,发挥人工智能红利推进就业结构优化和就业质量提升,实现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劳动者就业平稳增长的“双赢”。

伴随人工智能新技术的涌现,新的劳动需求和就业岗位应运而生。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扩散和应用本身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创造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组织,进而催生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由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将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并增加劳动者收入,总投资和总需求也将因此扩大,进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在诱发技术变革并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其对就业的“替代”主要发生在程序化、重复性的工作岗位,导致那些低技能、非熟练性的工人甚至具有一定经验和技术的工人面临较大的被取代风险。从蒸汽技术变革、电力技术变革和信息技术变革等数次科技变革的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颠覆性的生产力变革都导致那些最易被新技术替代的劳动力面临“掉队”“转型”或“离场”等就业

风险。而且人工智能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其不仅能替代人的体力,还能在某些方面替代人的脑力,如超级计算、记忆存储、精准操作等。快速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给就业结构带来的变化,需要多措并举,精准发力。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组织发展,稳步扩大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每一次大规模创新活动,都将淘汰陈旧的生产技术,并随之带来新的生产技术运用和新的生产体系建立。长期来看,由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新产业、新业态、新组织将会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和灵活多样的就业岗位。为了稳步扩大上述就业创造效应,一方面,政府可以引导“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发展,有效利用省内已有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资源,加快培育人工智能相关新兴产业,积极鼓励发展新业态、新组织,尤其要大力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技术密集型龙头企业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以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及其引领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实现人工智能在更多产业领域的“就业创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引导促进分散化、多样化、非常规性的就业形式,并提供针对性的、充分完善的就业扶持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开创新兴产业、新组织、新业态竞相发展和就业稳步增长的“双赢”局面。

以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不利冲击。对于已经明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的安徽而言,其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在人工智能平台、智能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智能语音设备等核心领域有着良好的产业布局,人工智能在新兴产业、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深入应用正在催生大量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和一定数量的协作性劳动力需求。目前,人工智能应用仍处在初级阶段,将一定程度替代低技能、非熟练的劳动工人甚至部分具有一定经验和技术的操作工人。为了化解上述不利冲击,一方面,引导人工智能应用相关企业逐步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劳动者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适应性,有效缓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不利冲击。另一方面,深化针对性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改革,加大能够适应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职业培训投资力度及职业技能培训强度,这不仅能够及时化解人工智能的负向就业冲击影响,还能够妥善解决职业院校毕业生择业就业困难、就业收入偏低等现实难题。

以深化高等教育及其科研体制改革,提升高技能人才存量及增量。目前,安徽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等丰富的科教资源,但人工智能开发及应用方面的专业化、高端人才存量仍然偏少,由本地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所培养的高技能人才还面临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外流的问题,而且本地新兴产业在吸引外地高技能人才流入方面依然面临集群发展优势不明显、薪酬竞争力偏低等现实困境。对此,政府要大力支持本地高等院校围绕人工智能开发及应用而设置相应的学科专业,以培育大量的高技能人才。要深化高等教育机构科研体制改革,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认知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等本地研发机构,注重提高人才供应和本地新兴产业需求的匹配度,进而为安徽人工智能发展培育大量专业性的高技能人才。此外,政府还要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在高技能人才引进方面的密切合作,为有意选择本地就业和发展的国内外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积极提供职业发展、薪酬福利、置业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配套服务。

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失业人员救援政策,提升就业公共服务质量。对于正在致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安徽而言,特别需要重视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劳动者群体的失业风险和就业转型。在当前的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正在沿着产业链集群化的方向重构,这将导致更多产业资源流向开放程度更高的沿海地区,而且国家正在加快以人工智能、5G网络、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因素都将一定程度增加上述的失业风险。为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发展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政府要进一步优化覆盖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内容的普惠性基本社会保险体系,尤其需要强化这些基本保险政策的实际执行力度及实际执行效率。同时,进一步完善针对不同失业人群的失业救援制度,除了鼓励企业完善员工就业培训和技能提升制度以外,还可以牵头建立针对技术性失业的线上及线下帮扶平台,为失业者提供必要的心理建设、就业技能培训、生活救助等方面的综合服务。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在分工协作中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方大春 裴梦迪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所在。《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不仅是安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产业间、区域间的分工协作来完成。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分工细化、交通一体化时代,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往往不是一个地区就可以做到的,而需要更大的经济范围。《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行动计划》中指明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路径,即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布局未来产业,围绕重点产业布局,聚焦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沪苏浙地区是国内科教资源最密、创新能力最强、产业基础最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安徽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要以创新人才、创新平台和创新资本等为支撑,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

以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融合为着力点,夯实产业发展动能。一方面,围绕产业链条布局创新链,提升科技赋能产业水平。围绕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产业技术瓶颈,组织开展科技攻关、协同创新部署创新链,承接产业转移补齐产业链,促进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支持合肥、芜湖、马鞍山等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网络,重点建设下一代人工智能及工业机器人共性研发平台、新能源汽车共性研发平台、中德人工智能研究院、机器人产业研发检验检测中心等高端研发创新平台,着力打造长江经济带产业创新中心。积极承接长三角地区智能化、绿色化的关联项目,加快钢铁、石油化工、有色、建材、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升级,推动产业

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打造科创产业高地。要以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共创”为牵引,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建设为重要载体,形成多点支撑、多层并进的创新平台体系。一些已经具有转化价值的阶段性科研成果可以提前直接付诸转化。安徽量子科学、人工智能、超高速、高世代玻璃基板等技术研究走在国内前列,在不断取得研发阶段性新突破的同时,也要在过程中推动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实现“沿途下蛋”。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转移区域联动,推动技术市场互联互通,促进更多科技成果集聚转化,吸引沪苏浙资本涌入,形成投资高地。

以对接与利用上海“五个中心”为支撑点,激发产业发展活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需要参与到全球大市场的竞争中。目前,安徽省产业体系品质不高,难以直接整合全球资源,需要有支撑点来推动。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不仅能向安徽转移部分产业,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借船出海”模式,利用其国际经济中心辐射能力、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国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能力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要支持安徽省龙头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销售中心等,推动安徽省更多企业在全域范围内整合资源。

以打造产业链生态链为切入点,增强产业发展引擎。产业链上企业生态位重叠是产业内竞争激烈的主要原因。从生态位理论视角,通过延伸产业链,拓展生态位,重构产业边界;分离原有的生态位,重构企业边界。产业链延伸以后,链条加长加宽,产业链上的企业分工开始变得明确,企业的生态位重叠部

分逐渐分离,企业的边界逐渐清晰,在产品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竞争逐渐降低,合作共生的可能性增大,产业链将更加稳定,竞争力更强。产业内的企业能够跨越现有的产业边界,跳出与同行企业直接竞争的模式,不再受制于产业边界的束缚,重新开创一个新的产业生态位空间,即可完全避免企业生态位重叠带来的过度竞争,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因地缘相近,长三角地区传统优势产业相似。安徽省传统优势与上海市有相同之处,汽车、化工、钢铁等传统产业都同样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转型升级方向与定位不能相同,需要精准定位产业“生态位”,形成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蓬勃发展新格局,打造共生产业集群。

以共建合作园区为连接点,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需要高水平园区支撑。目前,安徽省开发园区与沪苏浙地区发达园区在创新理念、服务水平、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距。建设园区对标机制,通过挂职、考察等方式学习吸收沪苏浙地区先进园区创新、产业、人才、投资、金融、财税等方面做法,进行机制体制创新,缩小园区发展软环境差距。可以尝试共建合作园区,输入沪苏浙发达园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共建合作园区关键在于成本如何共担、利益如何共享。创新合作园区共建共享机制,通过股份合作、产业招商、托管、总部基地、缔结友好等模式,全面推进安徽省级以上开发园区主动与沪苏浙地区城市建立友城合作关系,通过在国外建立招商网络、派驻招商人员、聘用商务代表等方式,开展境外联络、咨询、服务,深耕当地产业合作机会,谋划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突破,输入园区管理经验。

(作者单位: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工业大学基地)

共享模式缓解用工就业“两难”

范海洲 丁仁船

“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的企业间临时“借用”的应急措施,解决了企业间的“忙闲不均”,但从长期来看,这又是一种员工共享机制,对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因此,“员工共享”的灵活运用模式将会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高校与企业的人才共享。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企业面临“用工难”的问题,同时高校毕业生又即将面临“就业难”的现象。建立高校与企业的人才共享机制,将会推动高校与企业的优势互补、人才资源共享。通过搭建高校与企业的人才共享平台,一方面可以组织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为企业提供专业指导与技术支持,和企业共享科研成果,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为公司发展注入更多的支撑力量。另一方面,将高校毕业生的课程学习与毕业实习直接植入企业。当前,高校学生无法返校上课,高校毕业生亟需完成学业以顺利毕业。尽管很多高校已开始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线上授课模式,但和传统授课模式相比,学习质量也很难得到相应的保证,尤其是难以完成毕业实习任务。因此,将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实习直接植入企业,既可以缓解企业用工的燃眉之急,也能让学生尽快实现由学生向员工的角色转变。利用高校与企业的人力资源,企业可以将一些居家能够完成的工作分解、打包给高校,高校学生可以居家实习,企业降低了用工成本,解决了“用工难”问题,高校学生也解决了毕业实习问题。企业通过共享高校人力资源,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阶段用工不足困境,而且对于在实习中

表现合格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录用,节约了招聘时间和招聘成本。

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共享。为保障共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康有序的共享环境,需要企业、高校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企业和高校应遵循相关规定并加强自我监管,自觉维护共享发展模式的市场秩序。政府要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为企业和高校创造良好的资源共享环境,搭建好资源共享平台。政府尽快出台鼓励共享发展模式的政策,积极引导和促进共享模式发展。在大学生就业方面,要尽快完善政府主管部门、服务部门与高校间的对接机制,鼓励相关人力资源社团机构牵头组织参与高校毕业生对接,并对具有社会公信力、组织能力强、对接效果好的社团组织,在评比表彰、政府购买服务乃至补贴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或政策倾斜。在企业用工方面,要鼓励企业探索推行“共享员工”模式,引导阶段性员工富余的企业,向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协议派遣员工,鼓励和支持企业之间自行调配人力资源。政府制定稳岗激励政策,支持和允许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岗、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确保“失业不增、就业不减”。同时,政府要加快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严厉惩罚失信行为,提升社会对信用的重视,实现全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引导人们建立诚信的社会氛围,降低共享模式的交易成本,并逐步探讨、尝试在共享模式下劳动关系治理的创新。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以政策性融资担保助推普惠金融

张一章 秦虹霞

融资担保对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融通,特别是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因此,政府积极构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引导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深耕普惠金融领域,多元化、多维度加强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支持,对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当前,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借力政策性融资担保助推普惠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保经营、稳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精准定位要有“高度”。为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然而,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与现阶段信贷服务实际覆盖面之间存在差距,这就需要融资担保机制特别是政策性担保机构发挥桥梁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要引导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坚持普惠性和准公益性功能定位,聚焦主业,坚守扶小、广覆盖、低费率、可持续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要求重点扶持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在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前提下,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要适时调降担保费率,切实有效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综合融资成本。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考核上淡化盈利要求,着重考核小微企业和“三农”数量及占比、放大倍数、担保费率和代偿损失率等指标,鼓励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担保服务。

政策支持要有“温度”。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整合各级财政资金、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市县配套专项资金和省担保集团增资金,建立政策性

融资担保机构国有资本持续补充机制。例如,合肥市打造了以兴泰担保集团为主体的市级融资担保平台,通过以股权为纽带、以业务为抓手,将原本散落分布、各自为战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编织成高效运行的市县区域和业务领域双覆盖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网络,有效增强了全市融资担保体系的服务小微和抗风险能力。地方政府要将新型政银担合作成果纳入本级政府绩效考核、企业信用评级、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评、政策性担保公司监管评价以及相关企业年度考核,以制度激励保障试点银行和担保机构参与新型政银担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对依法合规经营、年化担保费率不高于国家规定标准、融资担保放大倍数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以上、且完成政银担年度目标任务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要给予担保费补贴支持。

创新服务要有“深度”。根据小微企业行业、发展阶段等特点,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可以通过“融资+”创新增值,积极推动担保产品创新,推出诸如创新贷、惠农贷、科保贷、投保贷、专利贷、文化创意贷等特色产品。科技企业较多的地区,可以探索设立科技融资担保公司,精准支持民营小微和科技企业融资。同时,要持续发力推动融资担保服务模式创新,多举措引导银行担保机构在小微金融服务上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融资担保机构面对的都是银行不愿意直接放贷的企业,在当前经济状况下,收益与风险不对称更为突出。为保持融资担保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早在2014年安徽省就创新推出了政银担贷款模式,也称“4321”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该模式改变了由融资担保机构承担全额代偿风险,政府补贴融资担保机构的传统模式,打破了过去银担合作中银行不分担代偿风险的惯例,引

人政府、再担保、银行共同分担风险。各地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持续发展要有“广度”。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要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推动建立担保项目共享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自主深耕产业领域,研究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多样化的融资需求,不断提升自身的产业服务能力,形成担保行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加大对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客群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创新政策性担保行业流动性管理新模式,推动成立担保行业保障基金运营机构,打造“政保银担”四位一体合作体系,为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流动性管理和特殊资产管理服务,有效拓展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渠道,提升处置效率,缓释存量风险,有效降低行业流动性压力。

科学监管要有“力度”。要坚持审慎监管与分类监管并重,健全完善地方融资担保机构监督管理配套政策,明确地方金融活动的准入门槛、监管责任、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发挥融资担保监管信息系统定期报告报送、资本金监测、高管履职备案、企业约谈、监管联席会议分工联审等制度作用,实现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全流程管控;建立监管评级指标体系,加强年度现场检查、企业信用评级、监管计分结果应用,按照扶优限劣原则,对依法合规的机构支持其做大做强,对存在违规行为的机构,从严监管督促其整改到位。同时,还要推动建立担保行业培训考试等工作,全面提升机构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行业发展营造诚信有序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作者单位:合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安徽日报微博



安徽日报微信



安徽日报客户端

联系电话

0551-65179232

投稿邮箱

ahrblb@163.com